

自由还是保护：19、20 世纪英国 围绕关税与贸易问题的争论

滕淑娜¹，吴婷婷²，朱新顺³

(1.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2. 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3. 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英国出现了两次围绕关税与贸易问题的大争论，两次争论都围绕着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问题展开。争论中，双方各持己见，持贸易保护观点的一方认为，英国实行贸易保护、设置关税壁垒有利于保护本国经济不受外来经济的侵扰，进而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主张自由贸易的一方则认为，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对国际商品市场和廉价原料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实行自由贸易、减少甚至取消关税壁垒更能促进英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两次争论的结果最终均以自由贸易的胜利而告终，由两次争论可见，一国贸易、关税政策的选择与该国的国内国际形势、国家利益集团、政党及大众舆论等密切相关。

关键词：自由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改革；谷物法；约瑟夫·张伯伦

中图分类号：K561.4；F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4)02-0141-09

收稿日期：2024-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SS049)：19-20 世纪英国关税与贸易冲突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212)：多卷本英国赋税通史。

作者简介：1. 滕淑娜(1975-)，女，山东莱阳人，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校外合作博士生导师；

2. 吴婷婷(1998-)，女，山东莱阳人，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3. 朱新顺(1999-)，男，山东滕州人，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2.006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英国围绕关税和贸易问题进行了两次大争论。第一次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受工业革命影响，英国工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对国际市场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现行关税和贸易政策已不能满足英国发展的需要。由此，19 世纪初，围绕保护还是自由、是否继续设置关税壁垒进行了一场大的争论。19 世纪中期，《谷物法》和《航海法》的废除标志着自由贸易主义者的胜利，英国进行了一系列降低甚至是废除关税的改革。然而，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德国等国家兴起并设置关税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对英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此，英国国内围绕自由还是保护展开了第二次大争论，这次争论仍以自由贸易者的胜利结束。回顾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英国历史上这两次大争论，一可系统了解贸易和关税政策演变对英国的重要影响，二可为今日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关税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思考。

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 19、20 世纪英国关税和贸易政策的专门论述尚不多见，^①学者们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对英国某个时段的关税及贸易问题进行论证。有鉴于此，文章以保护还是自由为切入点，对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英国历史上围绕关税与贸易问题的争论进行梳理，以期厘清这一阶段英国关税与贸易政策的

^①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孙莹：《英国 1903-1906 关税改革运动的失败探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 年第 12 期；孙莹：《约瑟夫·张伯伦关税改革运动中的经济思想研究》，《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 年第 11 期；孙莹：《历史学派帝国特惠思想和张伯伦关税改革运动》，《学海》2018 年第 2 期；滕淑娜：《论 20 世纪初英国关税改革与自由贸易之争》，《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 年第 4 期；刘成：《英国废除〈谷物法〉刍议》，《史学集刊》2013 年第 1 期；欧阳萍：《从关税改革看英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学海》2011 年第 5 期；张本英：《罗伯特·皮尔与〈谷物法〉的废除》，《学海》2003 年第 5 期等。

演变历程、争论的内容和特点,争论中政党、各利益集团的态度和政策差异及趋同,以及争论的影响和启示等问题。

一、自由还是保护:19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中期的争论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的生产力迅速发展,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迫切希望打开世界市场,获取廉价的原料和商品销售地。但此前的重商主义理论在英国仍占主导地位,在这一理论的主导下,为了维护土地贵族利益,政府颁布了《谷物法》。《谷物法》的推行阻碍了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妨碍了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工人阶级等社会普通群众的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英国社会各阶层围绕关税和贸易问题展开了 19 世纪的第一次激烈争论。

这次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英国应不应该废除《谷物法》,摒弃重商主义,实行自由贸易。围绕上述问题,英国社会各阶层各持己见,为方便阐述,本文选取最有代表性的贵族阶层、中等阶级、工人、经济学家和时任首相的皮尔的观点进行分析。19 世纪初,英国贵族阶层不仅在政治上掌控权力,而且是财富和土地的主要拥有者,因此这一阶层坚持推行《谷物法》,反对关税改革和自由贸易。就中产阶级而言,当时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商人、金融家、工业家、城市富人、资产阶级,^① 其中,工业资产阶级是中阶级的主要力量。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问题上,工业资产阶级认为《谷物法》不但会提高生产成本,还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关税报复,这样“既会增加英国工业品在国内的生产成本,同时也会减少其在海外市场的销售”^②。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大部分工业资产阶级反对推行《谷物法》,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工人阶级则认为,《谷物法》的推行会降低他们的实际工资。对此,一位名叫约瑟夫·肖(Joseph Shaw)的工人曾在奥尔德姆镇(Oldham)举行的一次反《谷物法》的集会上说道:“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谷物法》对工人阶级非常有害,我将告诉你我是如何证明这一点的。经过我的长期观察发现,当食品价格高的时候,工资就会很低,这充分说明了两三年来斯托克波特(Stockport)和其他制造业城镇的惨况。在当时,小麦的价格高达每夸脱 70 先令,而现在小麦的价格下降到每夸脱 45 先令,每夸脱小麦那时要比现在多付 25 先令。因此,在他消费的每夸脱谷物里,他可以用来购买衣服和其他舒适的必需品的钱就会减少 25 先令。……因此,我想说明谷物价格高时,实际工资就低,谷物价格低时,实际工资就高。”^③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希望通过自由贸易,提高自己的实际工资。

除上述三大阶级外,英国的经济学家也就自由还是保护进行了激烈争论,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数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关于《谷物法》的辩论。马尔萨斯认为谷物法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英国国内谷物的生产,以确保国内的粮食安全,也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论”。而李嘉图则对此做出反驳,并指出:国家安全论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敌对国家便不再对本国所需的粮食进行惯常供应;此外,即使在和平时期,若粮食供应国因自然灾害等不可预测的原因而导致粮食减产时,也必然会引起粮食出口的减少,进而对本国造成影响。而对此两种担心,自由贸易都会予以有效应对,“就第一点而言,一国向其他国家出口谷物,如果对这种出口贸易加以阻挠,就会使谷物价格大幅度下降,从而在商业上引起毁灭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已投入到土地上的巨大资本立即撤回,也依然无法避免使这个国家遭受巨大损失。”^④ 至于第二点,

^①这里借用了赫克斯特教授对中产阶级给出的定义——参见[英]E. E. 里奇、[英]C. H. 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 5 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高德步、蔡挺、张林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531 页。

^②James S. Olson and Robert Shadle, ed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1,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 334.

^③John Bright and James E. Thorold Rogers, eds., *Speeches on Questions of Public Policy by Richard Cobden*, vol. 1,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0, p. 251.

^④Piero Sraffa and M. H. Dobb, eds.,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vol. 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8.

“只要自由、广泛的国际贸易秩序在世界范围内已经确立，如果一个国家在短期内出现了粮食短缺的问题，那么这个国家的粮食就可以从世界上其他丰收的国家中得到补足。荷兰在粮食上差不多全部依靠国外供应，即使在欧洲的动荡期间，其粮价也是非常的稳定，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①

对于是否实行关税改革这个问题，英国首相皮尔（Peel）的态度对争论的结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起初和大多数传统的托利党人一样，皮尔对自由贸易持反对态度。在 1841 年，“皮尔正是作为保护主义者和反谷物法同盟的反对者上台的”。^② 但皮尔并不是一个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在是否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的问题上，皮尔曾在 1839 年的一次议会发言中说道：“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谷物法》不仅要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而且还要有利于工人阶级地位的改善以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否则谷物法在实际上就早已宣布完结了。”^③ 1840 年，受经济危机影响，英国社会矛盾愈发尖锐。据资料统计，当时城市技术工人的最高工资每周只有 18 先令，伯明翰有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需要靠政府救济过活。^④ 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形势，1842 年，皮尔决定对《谷物法》做出修改，通过降低进口谷物的税率来降低谷物价格。皮尔认为，“英国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主要连接点，当它在财政实力、创造力、声望和海军实力方面超越所有国家时，它不必害怕竞争。”^⑤ 1845 年秋，爱尔兰土豆危机爆发，为挽救危机，皮尔决定彻底废除《谷物法》，放弃对农业和大土地所有者的保护。

1846 年 6 月，议会通过废除《谷物法》的议案，争论最终以自由贸易的胜利而告终。“谷物法的废除是自由贸易在 19 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⑥ “《谷物法》废除之后，在英国，所有继续抵制自由贸易的企图都随之而去”。^⑦ 自由贸易的推行优化了英国的产业结构，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有数据显示，1801 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 32.5%，而工业占比只有 23.4%；而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农业的比重下降到 17.8%，工业所占比重上升为 36.5%。^⑧ 到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超过了世界的总和。^⑨ 1831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3.4 亿英镑，1861 年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为 6.68 亿英镑。^⑩ 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的中心，其世界贸易量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居于世界的前列。

二、保护还是自由：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争论再起

毫无疑问，自由贸易实行后，英国经济快速发展。但 19 世纪 70 年代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大萧条”，欧洲各国为保护本国工业，纷纷建立了关税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英国则仍然坚持自由贸易政策，这一政策导致英国既不能保护国内市场，也无法对他国进行必要的反击。有鉴于此，英国国内出现了号召重

① Piero Sraffa and M. H. Dobb, eds.,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vol. 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31-32.

②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vol. 2, London: George Philip & Son, Ltd., 1927, p. 402.

③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Richard Cobden*, vol. 1,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Limited, 1881, p. 150.

④ Herbert L. 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 to 1977*,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59.

⑤ Ronald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London: B. T. Batsford, 1976, p. 30.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60 页。

⑦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British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782-1901)*,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2, p. 276.

⑧ Phyllis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Trends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66.

⑨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269 页。

⑩ Phyllis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Trends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282.

回保护主义、放弃自由贸易的呼声，由此引发了 19、20 世纪的第二场争论。

1903 年 5 月，张伯伦发表了《伯明翰宣言》，标志着 20 世纪初关税改革运动的开始。这次改革争论的核心就在于要不要在帝国双方的商业和贸易交往中给予对方低于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关税，以帝国为单位设立保护关税，共同对抗来自外部的压力。张伯伦认为国内和英帝国的市场对英国工业发展以及工人就业至关重要，英国的命运已经和帝国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张伯伦希望通过帝国特惠制建立一个强大的关税壁垒来抵制外国工业品，同时为英国提供一个“无竞争”的工业市场。此外，“如果英国继续实行不受限制的进口政策，由于外国的商品更加便宜，这将迫使英国的商品价格下降，如此，英国人民将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或失去工作”。^① 张伯伦认为实行贸易保护建立帝国特惠才是帮助英国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

相较于此前，工商业资本家的态度在这次争论中发生了转变，他们与土地阶层一样都认为英国有必要再次实行贸易保护。在 19 世纪的最后 30 年里，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各国为了发展本国工业，纷纷设立关税壁垒，实行贸易保护。这导致英国的出口量减少了 4250 万英镑，而同期，以德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保护性国家对英国的出口总额则从 1872 年的 6 300 万英镑升至 1.49 亿英镑。^② 对此，工业资本家认为，正是自由贸易的存在，打开了外国工业品进入英国的门户，抢占了国内工业市场，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设立关税来保护国内工业市场，以维护自身利益。至于土地阶层，在 1860 年后，随着交通运输的不断发展和美国、加拿大等国粗放型、机械化农业生产方式的建立，粮食生产成本大幅降低。^③ 在自由贸易政策的影响下，外国凭借较低的粮食价格占领了英国农业市场，致使农场主破产，大批农业工人失业。^④ 因此，土地阶层希望进行关税改革，通过对国外农产品进行征税来保护国内农业市场，挽救农业危机。

与土地阶层和工业资本家不同，金融家认为 19 世纪后期的英国并未走向衰退，而是向着更为高级的阶段——由商业资本控制工业生产的阶段发展。其理论依据来源于 19 世纪后期无形贸易的强盛，在 1881-1885 的几年间，英国对外投资的平均收益达到了每年 96 000 000 英镑，在 1901-1905 年，平均收益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149 000 000 英镑。^⑤ 金融投资、航运等无形贸易的发展，不但补足了有形贸易的逆差，还为英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1901-1905 年，英国平均每年的有形贸易逆差为 177 000 000 英镑。而这几年间，无形贸易的年贸易顺差竟达到了 2.26 亿英镑，无形贸易在英国社会中体现了非常重要的价值。^⑥ 金融家认为只有凭借着同他国之间建立的良好关系避免贸易摩擦，英国的金融业才可以自由地吸收外国资本和进行对外投资以赚取利润。所以他们希望继续推行自由贸易，反对关税保护。

在这次改革运动中，工人阶级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运动爆发之初，由于之前经济危机的影响，工人们担心外国工业的冲击会引发国内的失业问题。对此，张伯伦于 1903 年 10 月 7 日，在英国制糖工业中心格里诺克举行的一次演说中讲道：“制糖业已经失去了；丝织业也失去了；铁工业受到威胁；羊毛业也受到威胁；棉纱业将要失去！……怎样才能拯救我们呢？”“那就让我们像那些文明国家一样来实行一些保护。”^⑦ 演说得到了格里诺克制糖业工人的热情支持。工人们希望工业能够得到保护，以挽救失业。但随着 1904 年英国对外贸易状况的好转，工人们对待保护关税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更看重关税保护给日常生

① Charles W. Boyd, ed., *Mr. Chamberlain's Speeches*, vol. 2, 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1914, p. 262.

② Charles W. Boyd, ed., *Mr. Chamberlain's Speeches*, vol. 2, 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1914, pp. 146-147.

③ 钱乘旦主编：《英国通史（第 5 卷）·光辉岁月——19 世纪英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91 页。

④ 1871-190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各类农业雇佣劳动力人数从 96.2 万人降到 62.1 万人。——数据来自 L. C. B. 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1837-1901*,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73, p. 265.

⑤ Phyllis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Trends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6.

⑥ Phyllis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Trends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6.

⑦ Julian Amery,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vol. 6,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69, pp. 471-472.

活所带来的影响。由于保护关税中对食品的征税会导致物价上涨,进而会提高生活成本。以至于在关税改革后期,他们又转而支持自由贸易。1906年保守党大选的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点。

除上述各阶级外,英国经济学家们对此也是各执一词。在当时,经济学家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是支持张伯伦关税改革、赞同帝国特惠的“历史学派”,比较著名的有剑桥大学经济系教授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伦敦政经学院院长威廉·休因斯(William Hewins)和伯明翰大学商学院院长詹姆斯·阿什利(James Ashley)。这一学派希望英国能够通过建立关税保护实施帝国特惠。对于无形贸易问题,阿什利指出,英国航运等无形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与国家的强盛和国内工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而相较于国家的强盛,无形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使得很多人对英国当前的情况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识。^①另一派是反对进行关税改革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这一派认为:“虽然帝国的关系必须培育并发展。然而,关税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这种方法无助于解决就业问题,还会给国家的财富带来极大的伤害。”^②根据自由贸易理论,资源的配置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自发达到最佳状态,某些行业虽然会因关税保护而得到更好的发展,但从总体来看会导致资源的错配,最终使民众深受其害。所以自由派经济学家对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持反对态度。

针对社会各阶级所持的不同观点,英国内阁各党派对此也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内阁可分为三派,自由党、保守党以及从自由党中分离出来的自由党统一派。^③自由党及自由党统一派对自由贸易政策表示赞同。时任财政大臣里奇说:“我认为,废除下层人民厌恶的谷物税是可取的。但是与殖民地建立特惠这能否给英国制造商带来实质上的利益是不确定的,同时这样还会招致国外的关税报复。”^④以张伯伦为代表的保守党人则宣称:“我们对帝国特惠制有信心,我们拒绝被自由贸易的教条所束缚。以前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科布登和布莱特所倡导的信条完全是人为捏造的,是错误的。”^⑤由此可见,自由党和保守党在贸易及关税问题的观点上针锋相对。首相贝尔福对此却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态度,贝尔福认为英国有必要采取“报复性关税”来捍卫帝国利益。^⑥但对于帝国特惠中所涉及的对食品征税这一问题,要看英国人民对此是否能够接受。^⑦由此可见,贝尔福同意建立报复性关税但不主张对食品征税,希望通过两种主张进行调和来帮助英国工业摆脱困境。

此次争论自由主义再次战胜了保护主义,1906年大选中保守党惨败宣告了张伯伦关税改革运动的失败。但此次争论的出现,无论是对英国经济的发展还是政坛的演变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政治方面,因《爱尔兰自治法案》问题从自由党中分裂出来的自由党议员在此改革运动中重新联合起来,以捍卫“传统自由贸易”为旗号,与张伯伦所领导的关税改革运动相抗争。最终在1906年击败保守党,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的再次胜利并未使英国经济好转,在自由贸易政策的指导下,维多利亚时代最后的繁荣也消失殆尽。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英国最终放弃自由贸易,实行保护主义。

①参见 W. J. Ashley, “Foreign Investments-Shipping-England as Entrepot-The Year 1872-Exports and Prices-Canada-The Future”, *The Tariff Problem*, London: p. S. King & Son, Orchard House, Westminster, 1904, pp. 211-263.

②孙莹:《约瑟夫·张伯伦关税改革运动中的经济思想研究》,《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年第11期,第32-38页。

③1886年,因《爱尔兰自治法案》问题,主张帝国统一的张伯伦等自由党议员从自由党中分裂出来。

④Sydney H. Zebel, “Joseph Chamberlain and The Genesis of Tariff Reform”,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7, no. 1 (November 1967), pp. 131-157.

⑤A. W. Coats,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Tariff Reform Campaign of 1903”,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1, no. 1 (April 1968), pp. 181-229.

⑥Ruddock F. Mackay, *Balfour: Intellectual Statesma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39.

⑦Ruddock F. Mackay, *Balfour: Intellectual Statesma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45.

三、两次争论的比较

19、20 世纪英国围绕“自由还是保护”在关税和贸易问题上展开了争论。第一次争论实现了从“保护主义”向“自由贸易”的转变。第二次争论以自由贸易的胜利告终，英国未能实现“再次转变”。那么这两次争论有何异同？下面笔者将对两次争论产生的原因，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及不同政党在两次争论中的态度以及两次争论的结果进行比较。

首先，从引发这两次争论的原因来看，二者有着相似之处。19、20 世纪的这两次争论，其原因都在于英国面临的客观环境的变化，导致现有关税制度和贸易政策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从而使国家和部分阶层利益受损，进而对现有关税制度和贸易政策产生争议。到 19 世纪中叶，英国传统生产方式发生改变，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的巨大技术改进与创新，使其领导地位一直保持到 19 世纪中叶。^①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曾对这一时期的英国作过如下描述：“约在上一世纪中叶，英国是棉纺织工业的主要中心……这些机器借助于蒸汽发动机，首先完成了棉纺织业的革命……由于采用了蒸汽，现在已成为本国繁荣的基础……以后，在整个工业体系的这场革命中，发生了反雅各宾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战争的出现使英国的工业品占据了大西洋彼岸的所有市场，并在欧洲大部分市场上获得了垄断地位。当 1815 年和平恢复时，其他国家还几乎不知道蒸汽机存在，英国早已使用配有蒸汽机的工厂将产品生产出来并销售到全世界了。在工业生产方面，英国早已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国家前面。”^② 在工业革命所爆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以及高额利润的驱使下，^③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希望获得更加廉价的工业原料和更多的产品销售市场，以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然而到 19 世纪后期，英国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再次发生变化，随着西方各国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英国在维多利亚时期利用蒸汽、煤和铁这些传统资源获得的优势正逐渐消失。从 1820 年开始，英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超过了 3%，但 1880 年之后下降到 2% 以下。^④ 正是由于 19 世纪中期英国的工业领先地位带来心理上的自负，新兴工业所需要的新原料、新动力、新设施，如汽油、电力、电气设备等，都没有被英国人所重视；而电报、电话、收音机、铝制品、人造纤维、塑料等新材料方面，英国也远远落后。^⑤ 英国世界工厂地位逐渐丧失，“出口经济”此时也面临着瓦解。随着 19 世纪后期欧洲各国工业化的推进和关税壁垒的建立。英国在早期通过“自由贸易”得以发展壮大两个必要条件：“先发优势”和“零关税壁垒”皆已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已经沦为自由进口，客观环境的变化使英国不得不对关税贸易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其次，两次争论虽相隔数十年，但在两次争论中土地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看待关税问题的出发点却是一致的。无论是土地贵族、工业资产阶级还是工人，对于关税政策的考虑大多是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他们所关心的是关税政策的变动对其自身经济利益所造成的影响。在第一次争论中，土地贵族认为《谷物法》所引起的粮价上涨必有助其财富的增加，但工业资产阶级认为这样会抬高生产成本，招致他国的关税报复，工人阶级则认为如此会降低自己的实际工资，所以大多数的土地贵族成为贸易保护的支持者，而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对贸易保护持反对态度。但到第二次争论时，英国所面临的客观环境早已发

① 英国在使用机器生产方法方面比所有的竞争对手领先了整整一代人。—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vol. 2, London: George Philip & Son, Ltd., 1927, p. 57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03-504 页。

③ 1772 年进口额为 1451 万英镑，出口额为 1772 万英镑。1802 年分别增加到 3144 万英镑和 4612 万英镑，分别增长了 117% 和 160%。1801-1850 年，官方估价的出口额从 2490 万英镑增加到 1.754 亿英镑，增加了 600%。——数据来自钱乘旦主编：《英国通史（第 5 卷）·光辉岁月——19 世纪英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2 页。

④ 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3, p. 235.

⑤ 钱乘旦主编：《英国通史（第 5 卷）·光辉岁月——19 世纪英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41 页。

生改变,在英国继续坚持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英国国内工业品的出口量大幅度减少,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又转而支持贸易保护。随着20世纪初英国对外贸易状况的好转,就业压力得到缓解,工人们又担心贸易保护会带来较高的生活成本,又再次调转枪口转而维护从维多利亚中期就开始实施的自由贸易。由此可见,经济利益才是各阶级中大多数人所关注的重心。至于经济学家们,其对于关税问题的认识,皆受其早年经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马尔萨斯早年出身于土地贵族,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学院精英式教育,^①意识形态自然会受到上流社会的影响。而李嘉图出身于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后期凭借自身努力步入上流社会,这便与勤勉的资产阶级相投契。在第二次论战中,阿什利和休因斯始终都与德国和美国的经济思想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阿什利本人更是在哈佛大学有着长期的任教经验。他们希望英国能够像美国和德国一样,通过建立贸易壁垒来夺回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而“自由学派”的领军人物马歇尔则深受斯密、李嘉图、穆勒等经济学家“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影响,且身处维多利亚时代的马歇尔见证了自由贸易给英国带来的巨大繁荣,“自由贸易”早已成为其心中坚实的信条。就像他于1982年写给普赖斯(Price)的信中所说的那样:“经济思想的实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工作,它是时代的产物。”^②在两次争论中,皮尔与贝尔福虽同为时任首相,但在关税问题的掌控上,二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做法。在第一次争论中,皮尔作为托利党领袖,力排众议,从实际出发,冒着政党分裂的危险毅然决然地废除谷物法。正如他在议会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铁和煤这工业的神经,给我们很大的利益制胜对手国家……在发明方面……在才能方面,我们都不输任何人……——所有这个方面我们都站在实行货物自由交换的国家前面,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还怕什么竞争吗?”^③他相信自由贸易才是英国此时所需要的,只有坚持自由贸易才能真正解决英国此时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说皮尔是“英国人民”的首相,那么贝尔福更像是“政府”的首相。作为保守党的领导人,贝尔福在心里是赞同张伯伦的关税改革主张的。但为了维护内阁的统一和稳定,对此问题贝尔福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总的来看,在这两次争论中,由于人们所处位置不同,且个人利益与观念交织其中,站在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标准,对于关税改革自然也就有着不同的态度。

最后,从这两次争论的结果来看,在第一次争论中,英国实现了由保护主义向自由贸易的转变,而在第二次争论中转变却未能再次实现。究其原因,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次改革虽然都受到了反对势力的阻碍,但不成熟的时机似乎是导致第二次改革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在第一次争论中,“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的支持者针锋相对,前者组建“反谷物同盟”,后者则有“中央农业保护协会”与之抗争。如果说1845年之前二者之间的博弈一直是此消彼长,那么爱尔兰灾荒的出现则将这种平衡彻底打破。由于农业歉收,在诺丁汉(Nottingham),有10580人(接近人口的五分之一)在教区接受救济。^④而当时解救灾荒较好的办法就是放开粮价,让外国粮食自由进入英国。皮尔迫于社会现实以及自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以来骚乱的压力,于1846年5月15日晚,提出废除《谷物法》的议案,最终以327:229票的优势在下院通过三读。^⑤保护主义向自由贸易的转变得以实现。在第二次争论中,张伯伦以19世纪末英国工业贸易的衰落为依据,将关税问题展开,希望英国能够建立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工业,以促进经济发展。在运动之初,张伯伦的确获得了较多的支持,得到了工人阶级的青睐。^⑥然而20世纪初英国对外贸易状况的好转使张伯伦赖以宣称的经济基础消失,这样便使关税改革显得不那么紧迫。除此之外,英国的衰落之势也只是相对

①参见 William Petersen, *Malthu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4.

②Alfred Marshall,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New York: Kelley & Millman, Inc., 1956, p. 379.

③夏炎德:《欧美经济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72页。

④F. W. Hirst, *From Adam Smith to Philip Snowden: A History of Free Trade in Great Britain*, New York: Adelphi Company, 1925, p. 28.

⑤F. W. Hirst, *From Adam Smith to Philip Snowden: A History of Free Trade in Great Britain*, New York: Adelphi Company, 1925, p. 35.

⑥1903年10月28日,张伯伦在利物浦准备演讲时,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整整持续了六分钟。

而言。自 19 世纪下半叶起,英国工业生产和出口比重虽然在世界份额中逐渐减少,但传统的支柱产业(煤炭、钢铁业和造船业等)依然表现强劲,1876—1885 年世界贸易中 73% 的钢铁仍由英国供应,^① 1880 年,英国煤的产量依然高于美国和德国的总和。^② 在钢质船领域,英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1890 年以前,英国商船的运输能力居于世界首位,1895 年,英国拥有全球远航运输船只总吨位的 73%。^③ 雄厚的航运实力为英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在 1896-1890 的五年间,航运业所带来的年均净收入基本维持在 62,000,000 英镑左右。^④ 英镑是绝大多数国际贸易的结算手段,伦敦仍是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所有这些都使英国保住了它在世界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在世界范围内,英国依然是当时世界的经济强国。^⑤

结论

综上所述,关税和贸易政策对于一国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正确的关税和贸易政策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缓和社会矛盾、提升一国的国力,而且还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19、20 世纪英国围绕关税和贸易问题的两次争论给我们以下启示:

首先,要注重经济政策的时效性。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其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促进都具有一定的阶段性。19 世纪中期,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促进了英国贸易的发展,然而到 19 世纪后期,德、美等国通过“关税保护”和新兴工业革命使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在此阶段,英国的工业竞争力已逐步丧失,自由贸易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石,成为无本之木。此时大部分英国人依然沉浸在自由贸易的神话之中,无视国际环境的变化,对英国工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⑥ 结果是,20 世纪初自由贸易的确立并没有给英国再次带来繁荣,反而将英国拉向了落后的深渊,在二十多年后英国又再次被迫回到了保护主义……由此可见,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根据本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对经济政策做出调整。

其次,政府采取何种贸易和关税政策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密不可分。一项经济政策的变动,在多数情况下必定会触动各方的经济利益,进而各方造成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出于个人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位置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而政府要做的便是要超越个人和阶级的狭隘性,从全局出发,把握事物的本质。在这两次争论中,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关税保护,各阶级中大多数人对关税问题的看法主要还是围绕自身在当前所获得经济利益而展开,对问题的根源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拿破仑战争后,英国的问题在于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先进生产与迫切需要廉价的原材料和广阔的商品市场之间的矛盾,《谷物法》的推行不仅不能缓解矛盾,而且还使问题进一步恶化,而自由贸易恰好是解决此问题的最好办法。在第二次争论时,英国工业竞争力早已下降,其他国家也早已建立起了关税壁垒,这在本质上已经宣告了自由贸易的结束,但大多数人并未注意到此时的症结所在,维多利亚后期无形贸易的繁荣更是蒙蔽了人们的双眼,使改革契机延误了三十年。

最后,一项经济政策能否顺利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虽然《谷物法》在提出之时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事态直到 1838 年才变得严重起来,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迫使

①Michael Dintenfuss, *The Decline of Industrial Britain*:1870-198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17.

②数据来自 Michel Beaud, *A History of Capitalism*:1500-1980,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p. 123.

③[英]H. J. 哈巴库克、[英]M. M. 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 6 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王春法、张伟、赵海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54 页。

④Phyllis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Trends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6.

⑤钱乘旦主编:《英国通史(第 5 卷)·光辉岁月——19 世纪英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78-79 页。

⑥在 70 年代初的出口贸易数字被超过之前,英国的工业霸权地位就已经过去了。——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vol. 2, London:George Philip & Son, Ltd., 1927, p. 581.

人们急需降低生活成本，于是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自由贸易”。而 1845 年爱尔兰饥荒问题的出现更是将社会矛盾激化。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英国首相皮尔认为自由贸易是解决现存问题的有效办法，并于 1846 年提出了废除《谷物法》的议案。在第二次争论中，由于 20 世纪初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张伯伦所引导的关税改革运动在开展之初引起了不小的反响，^① 但 1904 年经济状况的好转，却使关税改革显得不再那么紧迫，加上 19 世纪后期无形贸易的繁荣，使英国人认为之前的遭遇只是短暂的衰退，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下，他们坚信自由贸易能再次带领英国重返世界之巅。1906 年保守党大选的失败，宣告了“贸易保护”的失败，但在一战后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英国于渥太华会议上又恢复了保护关税的设立。由此可见，客观环境对于一项政策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性。

“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作为 19、20 世纪英国主要的贸易政策，在不同时期对英国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0 世纪英国围绕关税与贸易问题的两次争论不仅表明了一国关税和贸易政策受该国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还体现了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立场和利益需求的差别，更表现了国家对关税和贸易政策问题调整的重要意义。今天，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或打着“贸易自由”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等都对今天各国的关税和贸易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而言，如何在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下选择适合自己的关税和贸易政策显得尤其重要。

Freedom or Protection: the Debate Around Tariffs and Trade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Britain

TENG Shu-na¹, WU Ting-ting², ZHU Xin-shun³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re were two major debates on tariffs and trade in Britain, both of which revolved around the issue of trade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In the debate, both sides held their own views. The side that held the view of trade protection believ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de protection and tariff barriers in Britain would help to protect the country's economy from foreign economic intrusion and thus help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economy; the side that advocated free trade believed that, wit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Britain's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markets and cheap raw materials became more and more urgent, a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free trade and the reduction or even elimination of tariff barriers could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 an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Both arguments ended with the victory of free trade, which shows that the choice of trade and tariff policy of a coun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national interest group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 free trade; protectionism; tariff reform; Corn Laws; Joseph Chamberlain

[责任编辑 常伟]

^①张伯伦 1903 年 10 月 7 日在英国制糖工业中心格里诺克和 1903 年 10 月 27 日在利物浦对工人们发表的演讲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具体内容参见 Julian Amery,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vol. 6,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69, pp. 469-472.